

天圆地方

棋文

棋人

棋事

围棋文化散文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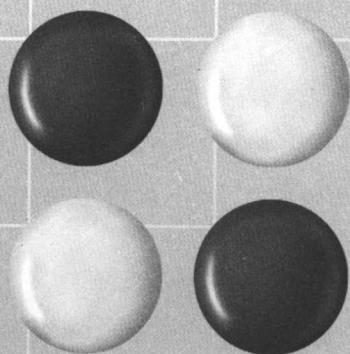
何云波
选编

棋论

棋友

棋艺

天圆地方



围棋文化散文选

何云波 选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圆地方:围棋文化散文选/何云波选编. - 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3. 1

ISBN 7-02-003982-0

I. 天… II. 何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
IV. I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7455 号

责任校对:刘光然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天圆地方——围棋文化散文选
Tian Yuan Di Fang Wei Qi Wen Hua San Wen Xuan
何云波 选编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78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125 插页 2

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ISBN 7-02-003982-0/I·3027

定价 18.00 元

编者简介

何云波，男，生于1963年，原籍湖南新田县。现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，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，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副会长。2002年获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称号。主要从事俄苏文学、比较文学和围棋文化研究。著有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》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，先后获教育部、湖南省社科成果奖）、《肖洛霍夫》、《回眸苏联文学》、《对话：文化视野中的文学》。专著《围棋与中国文化》作为人民出版社“中国文化新论”丛书之一，在围棋及中国文化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。曾应邀在首届中国贵阳国际围棋文化节“围棋之道·名人论坛”上作专题演讲。目前正致力于《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》的研究。

内容简介

围棋是什么？

围棋是竞技，是游戏，是艺术，是风情万种的“木野狐”，是黑白之道，是天上的云，地上的泥，是白纸黑字，一部承载往事的书籍，是生命的感悟，或者说，就是一种人生。

天圆地方，人居其间。说不尽的围棋，说不尽的人生。

这本《围棋文化散文选》，便是为古往今来各路英雄，提供一个纵论围棋之道的舞台。这里有古人论弈道，说弈事，有二十世纪的各类棋人棋事，有各色人等对围棋的感悟，有对话，有独白。众声喧哗，围棋也就有了万千的气象，丰富的色彩。

“试观一十九行，胜读二十一史。”中国围棋文化源远流长。在案边，在床头，翻天这本小书，聆听古今弈人文人的娓娓诉说，也许你时时会有所发现，有所会心：“共藏多少意，不语两心知”，正可谓妙味无穷，其乐也融融。

序 言

黑白之道

何云波

—

围棋是一种游戏。

这是一种关于生存竞争的游戏。大凡人类把现实中的各种争斗游戏化,便有了种种体育竞技。而当以游戏为游心之事,为精神之快乐,它便成了艺术。

黑白子,纵横十几道格子,先人们在这里演绎了无数的厮杀、争斗、悲欢离合。同时它也有着玄妙的意境,包含着宇宙之象、人生之道。围奘象天,方局法地,一阴一阳之谓道,围棋,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,犹如气功,犹如阴阳八卦。

围棋不知起源于何时?“尧造围棋,以教子丹朱”,这当然是附会。中国人往往喜欢把一些物品的发明权交到某位圣贤手上,这就像一位穷小子,攀上了富亲家,从此有了显赫的身份。但围棋产生于原始时代,却又是大为可能的。当原始时代的先人们,在地上画三五道方格,摆上几颗石子,或几根长短不一的树枝,做圈地、攻杀的游戏,也许,这便是古老之“弈”的雏形。

围棋本为玩物,后来却被赋予了许多别的意义。中国的儒

士们，一方面慷慨激昂，壮心不已，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样子；另一方面，又不失人好玩的天性，但玩物往往容易丧志，怎么办？最好的办法便是将这种“玩物”纳入到正统的规范、体系中，赋予它一种正面的意义，以玩得心安理得，名正言顺，不亦乐乎？不亦君子乎？

对围棋实施“招安”战略的始作俑者，便是东汉的大名人班固。这之前，围棋的地位一直不高。尽管孔夫子《论语》中就有教导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。不有博弈者乎，为之犹贤乎已。”这仅仅是说，如果无所事事，还不如下棋。亚圣孟子则把“博弈好饮酒，不顾父母之养”列为世俗五不孝之一，似乎围棋的盛行，已冲击到当时社会的伦理秩序。西汉时，围棋被当做“失礼迷风”、“简慢相轻”之物。围棋所具有的平等、竞争意识与儒家仁、礼之道相冲突，决定了围棋的被贬抑。而班固，却大大突出了围棋的正面意义：“局必方正，象地则也。道必正直，神明德也。棋有白黑，阴阳分也。骈罗列布，效天文也。四象既陈，行之在人，盖王政也。成败臧否，为仁由己，危之正也。”文以载道，棋亦载道，本为“技艺”的围棋，拥有了“道”的身份，也就获得了意义，有了存在的依据。

不过，围棋史上也一直不乏反对派。三国时吴地棋风盛行，人们“多不务经术，好玩博弈，废事弃业，忘寝与食，穷日尽明，继以脂烛”。乃至吴太子孙和要命群臣作《博弈论》，据说共获六篇，惟韦曜之作独占鳌头。韦大人也确实了得，引经据典，苦口婆心，循循善诱，义正辞严，拳拳之心天人可鉴。可惜韦大人的努力，终无济于事。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到魏晋南北朝时，竟迎来了中国围棋的第一个黄金时代。

魏晋时，围棋观念的一大变化，就是确立了围棋作为“戏”的独立存在的价值，并把它纳入到“艺”的范畴。这之前，无论赞成

还是反对,都不脱功利之心。韦曜说,围棋“胜敌无封爵之赏,获地无兼土之实,技非六艺,用非经国,立身者不阶其术,征选者不由其道。而空妨日废业,终无补益”。班固则强调围棋“上有天地之象,次有帝王之治,中有五霸之权,下有战国之事,览其得失,古今略备”。这两种观点,看起来针锋相对,实际上出发点或曰看问题的角度并无分别。

魏晋士人则反其道而行之,“生年不满百,常怀千岁忧。昼短苦夜长,何不秉烛游?为乐当及时,何能待来兹?”他们把足以引起人的精神愉悦的活动都称为“戏”,并确立了“戏”的价值。嵇康有诗曰:“琴棋自乐,远游可珍。含道独往,弃智遗身。寂乎无累,何求与人?长寄灵岳,怡智养神。”寄情于诗酒琴棋山水,成了他们释放自我的一种方式。与此同时,围棋也正式成为一种“艺”,并有了完善的品第制度。诗有《诗品》,画有《画品》,书有《书品》,棋则有《棋品》。沈约《棋品序》称围棋“体希微之趣,含奇正之情;静则合道,动必合变。若夫人神造极之灵,经武纬文之德,故可与和乐等妙,上艺齐工”。

在中国古代,“艺”有“技艺”与“道艺”之分。“道艺”指儒家六艺: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,甚至就指六经,拥有显赫的身份。“技艺”则是各类“术”、“技”,如医、卜、算、书画、博弈等,执此业者则为“技艺之徒”。韦曜说围棋“考之于道艺,则非孙氏之门也”,沈约则说它“可与和乐等妙,上艺齐工”,上艺者,道艺也。沈约不仅肯定了围棋是“艺”,同时还强调此“艺”非彼“艺”,用心可谓良苦。到唐代,琴、棋、书、画并称,棋正式成为“四艺”之一。

中国围棋大致包含“技”、“戏”、“艺”、“道”四个方面。“技”即“技艺”,“戏”即“游戏”,“艺”即“艺术”,“道”即棋道,人生、宇宙之道。中国从唐代开始出现职业或半职业的棋手,他们或做宫廷棋待诏,或依托于达官,或在茶楼酒肆陪人下棋,赌彩为生。

但奇怪的是,当某种“艺术”一旦成为职业,操此职业者成为“技艺之徒”,地位便急剧下降。棋史上曾有一传说,南宋棋待诏沈之才一日在宫中与人对弈,宋高宗观棋。见沈之才之棋有危急,谕曰:“切需仔细。”之才对曰:“念兹在兹。”上怒:“技艺之徒,乃敢对联引经耶?”命内侍省打竹篦逐出。棋待诏乃国手,实际上却不过是充当帝王享乐的工具。“技艺之徒”,竟敢引经据典,那就叫不识天高地厚了。

“技”与“道”,往往成了区分棋品、人品高下的分水岭。正因为如此,当人们想要拔高棋手的品位时,往往便要淡化他们作为棋手职业的一面,而将他们雅化、名士化。瞿世寿《〈不古编〉序》称国手吴瑞徵“视其所操之技,则弈也;察其所藏之蕴,非弈也”。而明末国手过百龄,“以相国之招而不去,以金吾之祸而不避,至知国家之倾覆而急归,为公卿门下客者,垂四十年,而未尝有干请。若百龄者,仅谓之弈人乎哉?”(《过百龄传》)“比德”者尊,“执技”者下,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重道轻技传统。

与此同时,文人们以棋为一种爱好,就像他们好在绢、纸上随意挥洒,笔走龙蛇一样,便成了一种雅尚,一种赏心乐事。棋有文人棋和棋士棋,画有文人画与画师画,两者在品位上竟也分出了高下。只是书、画孰好孰坏,由文人说了算。棋枰对弈,却是立马就要分出高下来的。文人往往技不如人,索性看淡胜负,以“胜固欣然,败亦可喜”、“善弈不如善观”相标榜。钱谦益称“余不能棋而好观棋,又好观国手之棋”。观棋而“语”、为人作序的同时,又作了许多观棋诗。张潮作《棋论》,谓翰墨棋酒,乃人生必需,“春雨宜读书,夏雨宜弈棋,秋雨宜检藏,冬雨宜饮酒。春听鸟声,夏听蝉声,秋听虫声,冬听雪声。白昼听棋声,月下听箫声,山中听松声,水际听乃声,方不虚此生耳”。围棋艺术化,人生审美化,正是中国围棋也是中国文化的动人之处。想想,当

“秋气晴美，天光照席，水波不兴”之时，扁舟一叶，棋枰一局，“江山之胜尽入局中”，该是一种多么令人神往之妙境。

游戏之事，或被当做饭碗，或被当做一种精神的艺术，小小黑白子，也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。而无论棋士还是文人，他们都愿意把围棋风雅化、玄妙化，以显示自己所执之“技”或所好之“艺”的不同凡响之处。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是《易经》，中国籍中最玄妙的也是《易经》。于是，将“弈”与“易”并举，甚至强调“弈”本身就是“易”，便成为一种时尚。《兼山堂弈谱·序》称：“弈之为言，易也，小数之乎哉。弈者变易也，自一变以至千万变，有其不变，以通于无所不变。”《弈理指归》称棋乃“按五行而布局，循八卦以分门”。汪缙《弈喻》以棋为“易”、为“天技”。如此种种，几乎成了论棋者不变的“定式”。

不过，当中国围棋被日益艺术化、玄妙化，日益成为一种“雅玩”时，它作为竞技的一面又被大大弱化了。

竞技得以真正实现的前提是人的自由与平等，中国封建等级专制社会，恰恰缺乏平等竞争的机制。中国古代围棋基本上是一种“玩物”，处在自生自灭状态，从未建立过完备的竞赛体制。而在文化观念上，中国文化重“和”忌“争”，作为争胜之道的围棋，或被当做“害、诈、争、伪”之物被贬抑，或被纳入到“仁”、“礼”、“和”的轨道中。“彼简易而得之，宽裕而陈之，安徐而应之，舒缓而胜之”（《弈棋序》），被认为是棋的取胜之道的最高境界。即便要赢，最好“赢止半子”，赢多者，嗜杀者也，非君子也（《弈喻》）。而事实上，中国古棋大多嗜杀，棋盘上硝烟弥漫，纸上谈兵时又如此的温文尔雅，理论与实践的脱节，成了中国古代围棋的一种有趣现象。

中国围棋，在清中叶以范西屏、施定庵“双子星座”的出现为标志，达到顶峰，此后，则开始江河日下。

这固然是随着国运衰棋运亦衰,另一方面,也有文化土壤、围棋观念上的原因。二十世纪,在中国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,中国围棋也开始了它的蜕变。

二

当围棋在它的故乡日趋没落时,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一个岛国,吸收了中国围棋后,又将它发扬光大。于是,古老的围棋,拥有了第二故乡,重新焕发出生命之光。

这个岛国就是日本。

一九〇九年,日本一个普通的四段棋手高部道平到中国来,横扫中国棋坛,中国所有名手都被打到让二至三子。中国棋界震惊了。山中才七日,世上已千年,中国棋界的闭关自守从此被打破。

日本围棋对中国围棋的改造,就是首先让围棋回归到它的本来状态:竞技,并建立了完备的竞争机制。金克木先生说:“日本棋士是专业,着重争斗、胜负。中国人下棋多是作为业余,含有表演意味,日本棋士是战士。中国棋士是艺人。”让一个提着刀的武士与一个拿着折扇的艺人同场较技,结果可想而知。其次,它敢于打破中国古棋的种种陈规,比如座子制,棋盘上顿时有了更广阔的供你自由挥洒的天地。

竞技之道与艺道、宗教之道的高度融合,所谓菊与刀,造就了日本棋道。中国围棋的转型,就是在日本围棋这种外力的推动下开始的。一种文化的转型,注定要在与他种文化的交汇中获得契机与动力。

一个伟大的棋手,也正是在这文化的交汇点上,横空出世了。他——便是一代大师吴清源。

吴清源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伟大的棋手，一个胜负师，更是围棋文化的巨匠和以棋发言的思想家、悟道者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吴清源才会受到棋界内外如此众多的关注。

郑也夫在《围棋·文化·边际人》一文中将吴清源称做一个“文化的边际人”。其实，二十世纪不少有成就的棋士都曾脚踏两种文化：韩国的赵南哲、曹薰铉、赵治勋、柳时熏、赵善津，作为炎黄子孙的顾水如、林海峰、王立诚、王铭琬他们都曾在围棋最发达的日本修业，其后或回到自己的祖国传播围棋的火种，或留在日本拼搏，取得杰出成就。当然，吴清源是其中最耀眼、最具代表性的一个。

吴清源是个文化的漫游者，他曾自称是个“国际游民”。生长在动乱的旧中国，其后又长期客居他乡，在战乱和颠沛流离中，历尽生活的艰辛。但另一方面，游弋于中日文化之间，又使他得以吸收中国与日本围棋文化的养分，兼收并蓄，最终成就他在棋盘上的伟业，人生中的大修为。同时，当日本围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又日益“程式化”、“僵化”时，吴清源作为一个文化的边缘人，他在吸取了“主流文化”（或曰“中心文化”）的长处时，又保持了来自边缘的客观性、超越性、批判性。这两者的融合，往往能造就一种“特异”的气质与才干。也正因为这种在“中心”与“边缘”之间游弋所造就的特异禀赋，才有了吴清源对主流传统的批判，在棋盘上的自由挥洒，不断创造。

如果说两种文化的汇通为吴清源的棋艺提供了多种养分，信仰则成了他的精神支柱。吴先生认为，他的一生都是在胜负与信仰中两路兼行，一方面作为棋士，在残酷的胜负世界中奉行武道；另一方面，将红教思想和东方哲学思想，当做人生的指南而自我陶醉于丰富的精神世界里。胜负与信仰，如同人离不开水与火一样，缺一都不可。

围棋固然是艺术,但又是一个赤裸裸的胜负世界,胜者为王败者寇,容不得任何的洒脱与浪漫。而像吴清源这类“外来者”,要融入到主流社会,被主流所接纳,就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与艰辛。在残酷的胜负世界里,他们是被逼到悬崖上的斗士,没有任何的退路,只有勇往直前,争取胜利。所以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,他们在绝境中所焕发的斗志,人的全部潜能,也是惊人的。从一九三九年的“镰仓十番棋”开始,到一九五五年与高川本因坊的大战,吴清源在十番胜负的舞台上坐播十回,对手包括当时所有的最强者,他将这些对手几乎全部打入先相先以至长先的境地,由此得了个称号:“十番棋的吴清源”。但吴清源事后却无限感慨:“十番棋”这种争斗形式,真是太残酷了,它就像悬崖上的白刃格斗,若不是身临其境地去尝试一下,断然体会不出那种恐怖的滋味。读读吴先生回忆录中的其中一节《镰仓十番棋》,读者定会深有同感。

吴清源在十番棋擂台上的胜利,表面上看起来风光八面,但他为此的付出,他所承受的压力,恐怕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吴曾把擂争叫做“用棋士生命作赌注的十番棋”。作为“外来者”,一旦被赶下擂台,就可能意味着棋士生命的结束。面对这种巨大的压力,有的可能因无法承受而脆败,吴清源却始终临危不惧,镇定自若,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。为何能如此?吴清源先生曾总结道:“我认为:我能超越民族和国境的界限,能保持镇静,临危不乱地奋战到底,这全都归结于我的信仰。”

为了追求信仰,吴先生也曾走过弯路,但他始终无怨无悔。在他看来,人的一世就是修行一世,无论是赢,还是输。

纵观吴清源的一生,既是作为大棋士在胜负世界里拼争的一生,也是作为宗教家修行悟道的一生。一为入世道、武道,一为出世道、信仰道,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,在他身上如此完美

地统一在一起,使他仿佛成了一尊“胜负里的慈悲”。金庸先生在《崇高的人生境界》一文中称其为“大宗师”:

佛家禅宗教人修为当持“平常心”。吴先生在弈艺中也教人持“平常心”。到了这境界,弈棋非但不是小道,而是心灵修为的大道了。吴先生爱读“易经”、“中庸”,在宗教上信奉各教殊途同归的红教。他的弈艺,有哲学思想和悟道作背景,所以是一代的大宗师,而不仅仅是二十年中无敌于天下的大高手。大高手时见,大宗师却千百年而不得一。

师兄桥本宇太郎称其为“昭和棋圣”,又像“禅房里修行多年的高僧”。

世有“棋圣”,也不乏“高僧”,然而能将这两者合二为一的,则吴清源一人而已。信仰,为他提供了精神的动力、人生的支撑。因为信仰,使吴清源在残酷的胜负世界里反而有了一份平常心,一份超出于常人的大无畏的勇气。他摈弃了胜负之念,反而使他成了可怕的胜负师。吴清源的手下败将藤泽库之助曾心悦诚服地指出:“吴氏棋艺已达‘真剑化’,实已与围棋混为一体。”这是剑道、棋道,同时也是一种宗教的境界。

川端康成在小说《名人》中认为,日本的武道、艺道同宗教的教义都是息息相通的,围棋是最好的象征。“胜负里的慈悲”,大概就是棋道与宗教相通后的一种境界吧!吴清源是少数达到了这种境界的人之一。他一生孜孜于棋道与人生之道的探索,两路兼行,都颇有所获,最后将两者高度统一在一起,获得棋道之真谛与人生的大解悟。丰子恺在追忆弘一法师的一篇文章中曾说:“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艺术的精神,正是宗教的。”宗教作为一种精神,归根结底,乃是对人生究竟的追问及其精神的

超越,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拯救及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寻求。当吴清源不断向围棋与人生的顶峰攀登,是否也超越了常人肉眼的视线,看到了许多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呢?对于吴清源的信仰,俗人恐怕就难用恋世和厌世、积极和消极来置一褒贬之辞了。

“经一生的磨炼,在棋中悟‘道’,在宗教中达‘理’,修成文武双全、人格和谐,性灵与日月同光,”——先生在其自传《天外有天》中的最后一句话,似乎成了其人生的写照。吴清源认为:围棋的最高境界不是冲突,而是和谐。吴清源一生都游弋于两种文化(中日文化)、两种人生(胜负与信仰)之间,一生都在各种冲突中寻找和谐。当他在与自我、与他人、与自然的关系中达到了心灵的和谐,他同时也就在棋盘内实现了理想的和谐之境。和谐,乃是中国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。对吴清源来说,和谐,就是他的宗教,这是一种棋的艺术,精神的艺术,人生的艺术。

三

笔者在贵阳围棋文化节上,第一次见到吴清源先生。在开幕式的开棋仪式上,他将第一手棋放在了棋盘正北中间的那个星位上,据说乃是源于易卦的“天一生水”。在《五环夜话》的录制现场,听他侃侃而谈。快近九十的老人,一进入围棋世界,就变得生气勃勃。两个多小时,毫无倦意,谈棋道,谈人生,谈二十一世纪围棋,似乎他的整个身心,也与围棋融为一体了。这时,我明白了,胜负早已成为过眼烟云,而吴先生身上的另外一些东西,却是更值得人细加回味的。

郑也夫在《功利·游戏·求道》一文中,将人生分为功利人生、游戏人生、求道人生三个层面。功利是为了满足人的种种欲望,游戏则更看中精神的快乐,求道则是“一种穷根问底的人生,一

种为生活寻找根据的人生，一种努力把渺小的自我融入博大的关怀中的人生”。人类的一切活动对当事者来说，都可能成为游戏，只要他沉醉于活动本身，淡漠于其结果导致的收益。同样，人类的一切地道的游戏，也可能会成为当事者的“工作”，只要他是完全为了求功利求报偿而投入其中的。吴清源先生无疑是一位纯正的游戏大师，因为他最完整地保持了作为一名棋手的本色，最执著棋艺，淡泊身外之物。过于功利容易使人患得患失，而游戏因为放弃了游戏效益及游戏之外因素的考虑，不为“盘外”形势所动，对棋道更趋于执著，又最有可能接近棋与人生之大道。

可惜，当今社会，却是过于功利主义的社会。围棋这种游戏早已被当做“饭碗”，原也是大势所趋，无可厚非。但是，当人们完全是为了“求功利求报偿而投入其中”时，就不能不令人沮丧了。二十世纪的中国围棋，日益走上竞技化的道路，它使中国围棋在技术层面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。但无庸讳言，现代围棋，也在日益失去许多东西。当人们为沉重的胜负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围棋的思想、围棋的美、围棋的艺术、围棋的快乐，却在日益丧失。李洁非在《意在棋先》中，对此有痛切的感受：“围棋到了现代，愈益制度化、商业化、锦标化、国际化，它的竞技强度和水平确实都大大提高了，但与此同时，棋手和围棋本身的天真、个性、自由本质却明显受到严重的挤压。金钱、名誉、地位甚至政治，都在对围棋发出各种诱惑与支配，使棋手心灵意识愈益不天真，不自由，甚而与围棋的本质愈益疏隔。长此以往，吾恐围棋将被釜底抽薪，从深富哲学、艺术底蕴的伟大的人文体系降低为一种雕虫小技般的空心之物。这应该说是在现代性笼罩之下围棋面临的一大挑战。”

围棋是竞技，也是艺术。在激烈的胜负之争中，它还应该包

含着艺术的创造。不少棋手，为名次、头衔、奖金计，太务实，太功利，太“形器”，围棋，也就日益失去了一种魅力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李洁非这位文人兼棋迷，看到在第三届农心杯三国擂台赛上罗洗河执白对崔哲瀚的那盘棋，罗本可平稳取胜，却突发奇想，毅然放弃不菲之角地，作屠龙之豪举。目睹这戏剧性一幕，作者竟感到一种“巨大的震撼”。在他看来，与战战兢兢以求一胜的棋手相比，罗洗河此役显然在追求一种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：一种跨越得失荣辱的棋盘上的唯美主义，一种对围棋内在的纯净的游戏意识的还原，一种直面本心的享受围棋的快乐主义精神。

一个普通的棋迷，会为也许在罗洗河看来当然的一手而感动，也会为一个棋手普普通通的关于围棋境界的感悟而欣喜：“抛开了简单的胜负，我的棋盘一定会变得很大，那样，我眼中的世界也将是很大很大。”（黄弈中语）也许是因为，这普通的一切，恰恰又是我们所缺乏的。当一个棋手一心只盯着胜负的世界，而在学识、修养、人生境界方面不能获得相应的提高，那他有可能成为大高手，却绝对无法成为一代宗师。围棋国手，作为一种智慧的创造者，也就比一般的明星有了更多的文化担承。棋手如何保持作为一个文化人的精神品格也就成了一个问题。多了些名利，少了些不凡的学养、宽广的胸怀、崇高的人生境界，当然也就没有了如吴清源一般的思想者、文化大师，也就无法负担起时代所赋予的伟大、崇高的使命。

也许，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围棋新生代代表的棋手常昊寄予某种期望。以常昊的资质、棋力，他登上世界棋坛顶峰应是迟早的事。他一次次的功亏一篑，恐怕非技不如人，而是被杂念所累。再加一番修悟，他一定会登临绝顶的。只是我们的期望不仅于此。中国围棋需要冲锋陷阵的战士，需要胜负的王者，但更